

台灣
高陽

金色曇花



金色昙花

台湾 高阳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金色昙花

高 阳 著

+++++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+++++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16 $\frac{1}{2}$ · 342,000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社目, 108-244 书号, 10309-44 定价, 2.85元

做了八十三天“洪宪皇帝”的袁世凯，终于发现自己被他的长子袁克定，表弟张镇芳，以及一班以“拥立”为长保富贵之计的“文臣武将”，撮弄着坐在一座热灶上，不赶紧跳下来，只怕难逃焚身之厄。

跳下“热灶”的方法，首先是下一道“罪己之诏”，撤销帝制。这道“诏书”自非大手笔不办。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担当这个重任。

此人名叫张一麟，字仲仁，苏州人。光绪二十九年开“经济特科”，他由江苏巡抚保荐应试，初试一等第四，复试一等第二，发往直隶以知县补用。那时袁世凯当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一见投契，收入幕府。在袁世凯未称帝以前，他是公府的机要局长，当“洪宪六君子”策动北洋军阀，纷纷劝进时，左右心腹中唯有张一麟苦谏力争，反对帝制。袁世凯虽未听从，但知道他的本心无他，而张一麟感于袁世凯多年知遇，亦始终追随不去。

“仲仁，我很后悔，当时不听你的忠告。现在取消帝制的申令，非借重你笔下不可。”

张一麟义不容辞，亦且当仁不让，他的笔下很快，唯独这道申令，字斟句酌，花了半天的工夫，方始脱稿。以“予”自称，结论中仿照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的成例说，“总之，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今承认之案，业已撤销，如有扰乱地方，自贻口实，则祸福皆由自召，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，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。”

“很好，很得体！”袁世凯提起笔，将“予本有统治全国之责”的“予”字勾掉，添上“本大总统”四字。

张一麟倒抽一口冷气，心想皇帝做不成仍旧可以做大总统，世上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！看样子，袁世凯的梦还没有醒。

申令在“洪宪元年”二月二十二日发布，第二天又明令取消“洪宪”年号，仍恢复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。同时又有一道命令，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。这些命令，由国务卿徐世昌签署，经由“政事堂”颁行全国。

徐世昌是光绪十二年的翰林。翰林有红有黑，红黑之分在文字通不通。徐世昌是个不大通的黑翰林，从未当过考官，亦未派过“撰文”的差使，郁郁不得志好几年，自然而然想到“穷则变，变则通”那句话。恰好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练兵，需人相助，而徐袁是故交，据说徐世昌由河南进京会试的盘缠，还是袁世凯送的。有此渊源，徐世昌便以翰林身分，纡尊降贵做了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的幕僚。

到得戊戌政变，袁世凯出卖谭嗣同，向荣禄告密而有功，接着是庚子之乱，在山东巡抚任内处理义和团而为中外注目，袁世凯就此飞黄腾达，徐世昌亦随之扶摇直上，入阁拜相。不过，他对袁世凯的帮助亦很大。武昌起义，袁世凯复起，终于窃取了革命的果实，得以骗得隆裕太后的一纸逊位诏书，主要的就靠徐世昌在朝中的运用。

民国肇建，徐世昌以遗老的身分，侨寓青岛。民国三年，袁世凯左右杨士琦的淮系与梁士诒的粤系，势如水火，积不相容，淮系通过袁克定说动袁世凯，强邀徐世昌出任

新设的国务卿，以分梁士诒的公府秘书长之权。到得帝制议起，徐世昌表面沉默，暗中反对，最后辞职，隐居天津。

这一次重作冯妇，是帮老朋友的忙来收拾残局。他的想法是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申令一发表，各方讨袁的军事行动，没有再持续的理由，西南各省可望取消独立，而袁世凯的大总统的职位，亦就可以设法保全了。

当然，这不是容易的事，所以徐世昌除了冒用北洋大将而亦反对帝制的段祺瑞，以及原是副总统，而为“洪宪皇帝”封作“武义亲王”的黎元洪的名义，打电报给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等人，说“公等目的已达，请妥商善后办法”以外，又请出五个人来做调人。

这五个人之中，两个是武昌起义以后，南北议和的总代表伍廷芳、唐绍仪，一个是众议院议长汤化龙，一个是在江南具极大声望，曾经教袁世凯读过书的南通状元张謇，再一个是康有为——大家都认为西南护国战争，是梁启超所策划，而梁启超是康有为的掌门弟子，蔡锷便是康有为的“小门生”，万一康有为肯管此闲事，西南的情势，即可缓和。

这自然是妄想！康有为睚眦之怨必报，何况有戊戌告密那一段超级的不共戴天之仇？早在袁世凯称帝之初，他便有一通五千言的长函致“慰庭总统老弟”，嬉笑怒骂，刻薄到家，其中骂得最痛快的一段是：“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，终有归老之时，假令公四年前汗病，不幸溘逝，已极人生之望矣！况公起布衣，而更将相，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，今又称制改元，衮冕御冠，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，已数阅月，亦足自娱矣！公自审其才，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，而地位乃为羿浞、王莽，势变之险如此，尚不急

流勇退，择地而蹈，徘徊依恋，不早引去，是自求祸也。易曰：‘天之所助者顺，人之所助者信’，是以自天佑之吉，无不利。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，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。故天怒人怨，不助不佑，不吉不利，公之近状，必无幸免矣！”

这话在康有为看，是幸而言中，何肯管此闲事？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，唐绍仪反唇相讥，汤化龙力劝引退，张謇则婉转陈词，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。

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，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，能听从他的要求，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、巡按使通电拥袁，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。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：“已失之威信难返，未来之修名可立”，趁早“尊重名义，推让治权”，又说：“钩座在职一日，誓竭一日之孤忠，设事与愿违，则私谊拳拳，亦不忘于毕生。”言外之义，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，“推让治权”，他为了公义，亦会举兵讨伐。

至于云南、贵州、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，一共六条。前四条为：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，可贷其一死，但须驱逐至国外。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，将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，即所谓“十三太保”，明正典刑，以谢天下。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，约共六千万，应抄没袁世凯及“十三太保”的家产赔偿。袁世凯的子孙，三世剥夺公权。

见此光景，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，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。袁世凯一着错，满盘输，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。

“死棋肚里有仙着”，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：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，安徽蚌埠，跟长江巡阅使

“辩师”张勋、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。张倪二人，深表赞成。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、张镇芳二人去走这一步棋。

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，一个走外线，一个走内线。

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，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，所以兼理他的家务，在“洪宪”那几天，等于“总管内务府大臣”。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，跟溥仪的生父，醇亲王载灃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。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，搭上了“内线”——醇亲王的福晋，也就是溥仪的生母派尔佳氏。

她是荣禄的女儿，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灃的嫡福晋。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：载灃在辛亥那年摆脱了“摄政王”的衔头，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！”醇王福晋气得痛哭了一场。

在她眼中，丈夫是“窝囊废”。府里从张文治起，所有的男女下人亦都不怕“王爷”，怕“老爷子”。醇王福晋规定下人对她必须用这个称呼，表示她是一家之主，更表示对外的大事亦须由她做主。

“对外的大事”便是“恢复祖业”，醇王福晋从没有一天忘记过复辟。

为了复辟，她亲自展开交际应酬，通过荣禄的旧部去活动各地的将领，起义“勤王”。但从来没有成功过。即令如此，她仍旧充分信任她父亲的旧部，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。醇王府上上下下，大小无不一痛骂袁世凯，只有她是例外，说是“不怪袁世凯，只怪孙中山。”

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张镇芳敢走她这条路线。张文治告诉她说：“民党逼袁世凯逼得太狠了，袁世凯宁愿恢复大清

朝，徐世昌跟张勋、倪嗣冲都说好了。就怕王爷胆子小，请老爷子劝王爷出面，事情准成！”

“喔，”醇王福晋大为兴奋，“他们倒是怎么个做法呢？”

“这是机密大事，不能随便透露。如果王爷肯出面，袁世凯派张镇芳来见王爷，当面细谈。”

“好吧！”醇王福晋连连点头，“我跟王爷来说。”

到晚来夫妻灯下密谈，载灃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兹、兹兹事体大，我得找人来商量。”

“走外线”的梁士诒，在他的设在交通银行的私人办公处所宴客。客人只得两位，一个是宣宗——道光的嫡长曾孙贝子溥伦。皇室中，只有他跟袁世凯打过交道。原来“筹安会六君子”在设计中华民国大总统转变为“中华帝国大皇帝”时，认为逊清皇室的“劝进”必不可少。通过各种关系，跟内务府大臣世续倒是说通了。但谁都知道，老醇王一支包括醇亲王载灃，贝勒载洵、载涛及宫中四位太妃，一提起袁世凯，无不咬牙切齿。这样一个形同篡位的仇人，反要推戴他做皇帝，这话谁敢去说？

但毕竟找到了一个可以跟载灃去谈这件事的人，就是溥伦。他肯给袁世凯卖力，有正反两个原因，反面的是，他颇有牢骚，当初穆宗——同治出“天花”，不治而崩，又无皇嗣，按宗法应该由他继承皇室，结果慈禧选了侄子兼外甥子的载灃。

这是旧嫌，还有新恨。溥仪在毓庆宫开蒙念书，选了三个伴读，一个是他的胞弟溥杰，一个是载涛的儿子溥佳，再一个就是溥伦的儿子毓崇。“伴读”除了伴读以外，还

有一样用处，代皇室受过。

孩子到底是孩子，总有顽皮不受教，需要加以责罚的时候，但皇帝毕竟是皇帝，既不能骂，更不能打。象这样为难的情形，早在周朝初年就发生过，于是摄政的周公想出来一法子：“成王有过，则挞伯禽”，伯禽是周公的儿子，打打不要紧。成王如果觉得过意不去，自然就会守规矩了，是个很好的法子。

但溥仪的伴读有三个，毓庆宫的师傅陈宝琛，却只把毓崇当伯禽，专找他的麻烦。譬如毓崇好端端地在念书，陈宝琛会突然向他喝一声：“轻佻！”搞得毓崇莫名其妙，细看方始明白，是因为溥仪进书房蹦蹦跳跳的缘故。

这样一天不知挨多少骂，使得本来很用功的毓崇视书房为畏途，功课当然差了，挨骂也就挨得更凶。回家眼泪汪汪地诉苦，气得溥伦常常破口大骂陈宝琛“王八蛋”。

至于正面的理由，不外一个“利”字。其中又有公利、私利之分，私利是给溥伦个人的好处，公利则是以皇室劝进的表示，交换“袁皇帝”承认民国给予清室的“优待条件”。一共八款，最重要是前面三款：尊号不废，岁用四百万元，仍暂居宫禁。

“五叔，”溥伦跟载灃说：“优待条件是民国跟咱们订的，袁慰庭当了皇上，国号要改成‘中华帝国’，他可以不认帐。”

“这，这不会吧？”

“是的，本来不会，你把他得罪了，可就难说了。”

“商量，商量！”载灃把他的口头禅搬了出来。

商量的结果，内务府大臣一致主张优待条件必须保全。劝进不必溥仪出面，另用适当的方式表达。于是往返磋商，

达成协议，先由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个正式公文：“现由全国国民代表，决定君主立宪国体，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，为除旧更新之计，作长治久安之谋，凡我皇室，极表赞成。”

换来的是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：“先朝政权未能保全，仅留尊号，至今耿耿。所有优待条件各节，无论何时，断乎不许变更，容当列入宪法。袁世凯志，乙卯孟冬。”

由世续送还优待条件的同时，还带来了一张照片，是五、六岁大的一个女孩：“袁慰庭的十三小姐，他的意思想配给皇上。”世续说道，“特为让奴才来探探四位太妃的口气。”

“怎么能跟他结亲？”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一口拒绝。

同治瑜妃，尊号敬懿，平时与端康太妃不和，不过在这件事上，是站在一起的，她很能干，不必率直拒绝，只问：“袁家这个小姐，是嫡出的，还是庶出的？”

袁世凯的嫡室于夫人，比丈夫还大一岁，岂有望六之年的老姬，会有一个五、六岁的亲生女儿？世续心知敬懿太妃是明知故问，却不能不据实回答。

“庶出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中宫母仪天下，怎么能庶出？大清朝立后，从没有这个规矩。”

世续默然，也没有答复。好在袁世凯自己也想通了，这头亲事倒是不结的好，一结，不就更象王莽了？所以世续不提，他也不问；只根据内务府的来文，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，下了一道令：“政事堂呈称，准参政府代行立法院咨称，准清室内务府咨称，本日钦奉上谕：前于辛亥

年十二月，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，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，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，临御统治，民国遂以成立。乃试行四年，不适国情，长此不改，后患愈烈。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，改革国体，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。现由全国国民代表，推定君主立宪国体，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，为除旧更新之计，作长治久安之谋。凡我皇室，极表赞成。”等语，表示他的皇位，不仅出于“民意拥戴”，亦由“前朝禅让”。

于是，奔走其事的溥伦，获得了重酬。为袁世凯特任为参政院院长，俨然“国会领袖”。原来的院长黎元洪，封为“武义亲王”。

得到民国五年元旦，举行“洪宪皇帝登极大典”，事先由外务部函请各国公使，元旦入贺，结果只到了一位大使——此人非别，就是溥伦。由于“优待条件”规定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“大清皇帝”，所以溥伦的身分是清朝的“钦命大使”，盖了御玺的“国书”上说：“逊清大皇帝敬奉两宫圣谕：特派宣宗成皇帝嫡长曾孙溥伦为全权大使，代表清室全体，恭贺”云云。

溥伦达成了“大清大使”的任务，立即卸除了宝石顶花翎的朝冠与蟒袍，改换“洪宪”的公服到参政院去正式到任。他原来是参政，支大洋五百元，一当了院长，薪俸加了一倍，另外月支交际费两千元，比以前加了五倍之多。可惜，好日子只得两个多月，就快过完了。

“是青岛来的厨子。”梁士诒谦虚着说：“只怕菜不中吃，不过取个新而已。”

“虽新而实旧。”世续指着一道“龙井虾仁”——两湖龙井茶叶炒虾仁说：“这个菜是翁文恭发明的，我整整二十年没有吃过了。”

“那是戊戌以前？”

翁同龢是戊戌—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里被逐回籍的，不久即发生政变。提到这个年份，作为皇室一分子的溥伦，感慨特深，“戊戌以前还是好年头。”他叹口气吟道：“‘不须更说乾嘉盛，话到同光已惘然！’”

“安知同光中兴之世，不能复见于今日？”梁士诒接口说道：“事在人为而已。”

他生得长大白皙，气度安详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特予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，因此溥伦跟世续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，用眼神催促他说下去。梁士诒却慢条斯理地打了一下叫人铃，将他的贴身跟班梁贵唤了进来。

“上菜先在门口通知！”

“是！”梁贵轻声回答。显然的主仆早有默契，保密的工作做得很周到。

“项城的处境，不瞒两位说，自然很尴尬，但亦仅止于尴尬而已！”梁士诒说，“大家都以为项城想当皇上，实非深知项城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特为停了下来，等人发问。

发问的是溥伦：“他不想当皇上，想当什么？”

“想当内阁总理大臣。”

这个回答是溥伦与世续怎么样也想不到的，世续不解地问：“退居臣职？”

“世中堂这话说得太好了！”梁士诒拿起用康熙五彩窑的酒盅所盛的白兰地说：“真当浮一大白！”

当然，没有大杯干白兰地的规矩，主客都只喝了一口，接着往下说。

“说项城不想当皇上，当然是欺人之谈，不过，主要的是‘办共和’办失败了，这是条走不通的路。‘办共和’讲选举，试问中国有多少目不识丁的老百姓，选票上的名字都不认识，你叫他怎么投票？何况，有些名字，听都没有听说过，譬如伦贝子，有几个知道玉牒上的字派是‘溥’字？”

“是啊！”溥伦接口：“犹如大家都只知道梁财神，‘士诒’这个台甫，没有几个人叫得出来。”

“这也不过是共和不适国情的一端而已，此外还多。总而言之，项城的想法是，他要当皇上的念头也许错了，可是恢复帝制决不错。因此，”梁士诒的语气，很有力地一转：“项城可以不当皇上，但是，帝制决不能推翻！”

话说到这里，就触及核心了，世续与溥伦不约而同地有个疑问：“袁世凯不当皇上，那么谁来当呢？”只为世续发言在先，所以溥伦就让他说完。

“他不当皇上，谁来当？总不会是菊人吧？”

“东海岂能如此不自量？他的心存故主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”

“那么是谁呢？”溥伦有些忍不住了，“燕孙，你痛痛快快地说吧！他预备让给谁呢？”

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居之，项城一场春梦，如今醒了；唯有不负隆裕太后的付托之重，才是他的自处之道。”梁士诒肃然说道，“这是项城跟东海密议，也是区区赞襄的结果，决定如日本当年的幕府一样，‘奉还大政’！”

此言一出，客人皆是惊喜莫名的表情，世续却突然收

敛笑容，用责备的语气说道：“燕孙，你酒量很好哇！”

“世中堂以为我说的是醉话？此是何等大事，岂可妄言？”

虽然梁士诒郑重否认决非戏言，同时也可以肯定亦非醉话，但世续与溥伦仍旧需要有一段心理上适应的时间，才能相信所听到的是真话。

恰好梁贵通知来上菜，而且是现片上桌的烤鸭，自然而然就阻断了主客谈正经，可也没有聊闲天，一个个都是食而不知其味地咀嚼着单饼葱酱卷的烤鸭，在忖量这件大事的成败利钝。

等梁贵的踪影消失，世续随即开口，“燕孙，”他问，“这件大事，怎么做法？”

“当然是由项城主动，发表奉还大政的声明，皇上欣然嘉纳，降旨特派袁某为内阁总理大臣，负责组阁。”梁士诒略停一下说：“至于视朝的大典，不妨从长计议。”

“如果各省反对呢？”

“那亦只是西南两三省。照我看恐怕只有云南一省。广西的陆荣廷原是清朝的臣子，倘或反对，岂非叛逆。再说，就算陆荣廷也反对，亦不必担心，到那时候且不说有张绍轩、倪丹忱效忠，段芝泉、冯华甫的态度也不同了。”

张勋、倪嗣冲心存清室，是早就知道的，说段祺瑞、冯国璋的态度会改变，却不无疑问。世续便追问一句：“会吗？”

“会！”梁士诒答说：“他们不听项城的话，总还要听听东海的话。”

世续点点头，对他的答复，表示满意。

溥伦由于当过一次“大使”，比较了解“国际公法”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外国呢？会不会承认？”

“当然会。他们可以不承认洪宪，不能不承认宣统。如果不承认，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哪里？他们只好下旗回国。”

“那当然是不会有的事，他们有侨民、有买卖，不能丢下不管。”溥伦转脸对世续说：“这件事很可以做。”

“是的，很可以做。”世续答说：“回头从这里散了，我就陪伦贝子上‘北府’。”

“我正要找你们。有件事透着有点儿邪。内人告诉我……”

将这么一件“光复祖业”的大喜事，说是“有点儿邪”，使得溥伦和世续，都有啼笑皆非之感，因而话就不容易说得下去了。

“我们俩，刚打梁燕孙那儿来，就是要为这件事跟王爷请示。”

“五叔，”溥伦接着说下去，“这件事很可以做。唯一的顾虑，是外交承认的问题，我们也研究了，结论是各国可以不承认洪宪，不能不承认宣统，否则他们就失去立场，没有交涉的对手了。”

什么“问题”、“立场”，载灃最怕听这些新名词，不由得就象吃了青梅似地，牙根都有些酸了。

“最要紧的是，段芝泉、冯华甫的态度会变。他们反对帝制，就是不甘心管袁世凯叫一声‘皇上’，咱们皇上原来就是皇上，段、冯当年都磕过头的。”世续渐渐起劲了，“王爷，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，万万不可错过。”

“好吧！”载灃为他们说动了，“明儿‘上门’，先跟太妃

们回一回。”

“太妃那里不忙。”溥伦说道：“她们没有不赞成的。这件事只要五叔拿主意就行了。”

“我可拿不定主意，回头找老六、老七商量。”

老六是载洵，老七是载涛。载洵住天津，一时无法商量，将载涛找来一谈，他自然深感兴趣，不过，他认为这件事应该跟“宗社党”的要角谈一谈。

“宗社党”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才出现的一个政治组织，以“小恭王”溥伟为首，旗人中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良弼、铁良，都是重要分子。这个党的目的，顾名思义便知是为了挽救爱新觉罗皇朝，因此，反对退位，反对议和，更反对袁世凯。及至良弼被刺，北洋军阀又发了赞成共和的通电，宗社党才被迫同意清帝逊位。隆裕且曾传谕解散宗社党，不过暗中仍在活动，根据地是大连，后台是日本浪人及军部一部分野心分子，要角是肃亲王善耆、溥伟，及光绪皇帝的连襟，曾经掌过度支大权的“泽公”——镇国公载泽。

善耆与溥伟都不在北京，只有找载泽来谈。偏偏载灃最怕跟载泽谈正事。在他当摄政王时，载泽与奕劻争权，常常在事先、事后去找载灃，以“老大哥”的资格，提出强硬的要求。他的嗓门大，话又说得快，每每使得有些结巴的载灃，无法招架。

但也无法，这件大事如果作为“家务”来看，以载泽的地位，是必须听取他的意见的，等将他请了来，说知经过，载泽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相信有这样的好事？”

“我，我也不大相信；不过，有这样的好事，总要拿它